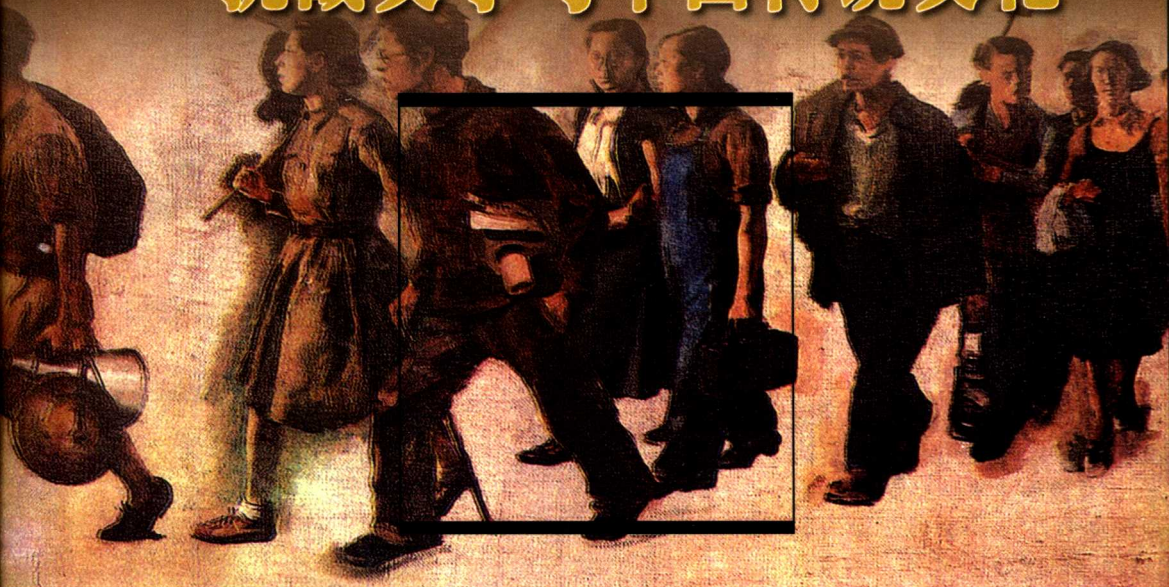


LISHIZAIZHELISHANGUANG

历史 在这里闪光

——抗战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文天行 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历史在这里闪光

——抗战文学
与中国传统文化

文天行 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2年·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在这里闪光——抗战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 文天
行著.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2. 10
ISBN 7-5408-3773-X

I. 历... II. 文...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
国-1937~1945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7876 号

责任编辑: 赵小平

封面设计: 邹小工

樊佳林

责任校对: 左倚丽

版式设计: 王 凌

责任印制: 黄 萍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 610012)

成都市勤慧照排中心照排

成都新凤印刷厂印刷

(成都市外北九里店 邮政编码 610081)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0.5 插页 2 字数 280 千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册

ISBN 7-5408-3773-X / G·3527

定价: 25.00 元

*

*

*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电话: (028)83116748

序

将中国抗战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不是偶然的。在沉默了 30 余个春秋之后的 1980 年，中国抗战文学才开始了有组织有规模的研究。经过 10 余年的努力，在不同文学形式研究的基础上，1993 年出版了《大后方文学史》。过了 3 年，也就是 1996 年，《中国抗战文学概览》得以问世。在不断扩大领域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传统文化对抗战文学——乃至抗战文化，有着潜在的巨大的影响，并且还注意到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就在主动做这方面的发掘工作，也正由于此才使我们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愿望：将传统文化与抗战文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我们已经出版的著作中虽说已经论及到这个问题，但很不充分。《中国抗战文学概览》完成之后，我们即着手对此做比较细致的思考，并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重视。1996 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将其列为省级科研项目，并给予一定经济上的支持，从而迈开了实际操作的步伐。

—

我国的传统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汉代的班固仅就先秦时期就归纳出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等最为活跃而又最有影响的 10 个学派。就整个历史来考察，传统文化还应包括汉以后传入我国的佛家学说和流传于民间的约定俗成的世俗公理。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目的呢，都是“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汉书·艺文志》）。即使这样，也有主次之分。

秦汉以后，无论哪个朝代，不管是处在创建期、发展期，

还是繁荣期、衰败期，都将积极参与历史进程的儒家文化视为立国之本。汉代董仲舒对儒家特别推崇，以为未有能及者，主张“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天人三策》），也就是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从其策，在长安设太学，以儒家经典为讲述内容，为儒学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宋代程颢、程颐以识仁、穷理为主，发展了儒学的理论体系，为治者提供治世之道，也为被治者制定了应守之规。二程致力于儒学讲授，一在10年以上，一在30年以上，对当时和后世影响之大，可想而知。明清时期的儒学，沿袭了效忠当世、完善自我的传统，大家的影响虽不及前，仍然在走着历史的新路。

不管儒家文化有多少不足、给历史发展设了多少绊脚石，都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即它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那以仁为中心的广博的学说，它那积极人世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主动性，它那规范神州社会发展之模式与构建中华文明的责任感，无论是在黄河两岸还是大江南北，都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深深的印迹。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融化在炎黄子孙血液中的历史参与意识常集中表现为民族情感的强烈。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精神大发扬就是这样的体现。不然的话，各种文学形式为何会均以发扬民族精神为最中心的主题？文学为何会出现民族热？抗战时期，尤其是1940年至胜利，郭沫若对先秦诸子做了深入的研究，充分肯定了儒家学派的历史地位和对抗战现实所产生的潜在影响，还以图匡正“五四”以来对孔子欠公正的过激评价。

以出世为主旨的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不容忽视。仅次于儒家的道家文化的影响也遍及神州，只不过这种文化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显现出了滑坡的态势。佛家文化为汉时外来，但有很强亲和力的本土文化很快就将其融会在自己的血液之中，使其成为了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如

此，各方还都坐视这种有特殊魅力的“入侵者”不断挤占道家的地盘。就历史主动性而言，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都无法与儒家相比，但也并非一尘不染。老子有致虚极、守静笃之说，也有治国安邦之教。他那小国寡民의思想和被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具体描写为鸡犬之声相闻而又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模式，就常为历代文人墨客津津乐道。常与老子相提并论的庄子又怎么样？明代冯梦龙《智囊》有一篇沈几写的序，对“以绝圣弃智为指归”的庄生做了全面的分析，结论也是：“盖苦心济世，非忘世也。”以西方为极乐的佛家文化也没有忘世，也在苦心济世——普度众生，甚至还有更积极的表现。回顾我国上千年历史的发展，道、佛参与社会政治变故的事实还少吗？抗日战争时期继承了这个传统，并且还添了新页。有的作家描写了隐居山林古庙的出世者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在抗日救亡浪潮鼓动之下，又重新入世，投入了奔腾的时代洪流。

民间那些实践性很强、约定俗成的处世哲学、风俗习惯、行为规范，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部分有很强的感性的色彩。感性色彩强了理性因素就要削弱，从而给正确判断与处理问题带来隐患。关云长的义气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曹操对关上马金下马银而不能动其跟刘备的志，后来关为报曹之恩又演绎出了捉放曹的故事。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关云长捉曹而不放曹，是不是三国时期的历史要重写呢？感性应该提高到理性，理性在现实生活中更具有指导性的意义。抗战时期的作家们对此是有明确认识的。在他们的作品中，往往将朋友之间的忠诚与友谊，甚至至于为朋友两肋插刀，与民族大义结合起来进行描写，摈弃无原则的抽象，从而将其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抗战现实中产生积极的作用。

经过上千年实验的检验，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以及民间约定俗成的处世哲学、风俗习惯、行为规范，构成了我国传统文化庞杂的基本框架。各种文化形态又都有自己丰富的内涵。比如儒家，他就有有别于其他各家的宇宙哲学、

政治哲学、人生哲学、艺术哲学。

各家文化并非在绝缘中生存，而是在相互影响中发展。追求长生的道家和崇尚无生的佛家看似泾渭分明，实际上也在相互渗透：前者同样向往另一个世界的极乐，后者也在不断探索如何才能长寿。儒家文化和以出世为特征的道佛文化有根本上的区别，但也非水火不相容。上千年的寒来暑往，自觉与不自觉地都在相互交流，切磋砥砺，以至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并显现了合一的倾向。有的庙宇同时供奉着儒、道、释之始祖就是有力的证据。民间的处世哲学、行为规范等等多受上述三驾马车的影响，而世俗的东西如果被认为不合乎“教义”，往往还被抑制和匡正。

二

传统文化内涵的丰富和相互影响的复杂深深浸润着如火如荼的抗战现实生活的土壤。抗战文学是抗战现实的产物，也是抗战现实的反映。

如果从形式上看，文学的反映主要有这样两种情形：一种是从形象描写中能明显地看到传统文化的根基——或者儒家学说的身影，或者道佛二家的痕迹；另一种就没有这么直接，作家呈现给我们的是隐形状态。在这种隐形状态中，很难指出作品中的描写对象与儒家文化或道佛文化中的具体什么内容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它让人体察得到与传统文化之间有无无数无形的连线，让人能确信那些典型形象的心理构成、行为规范是根植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的，是传统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

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就能发现文学作品反映了传统文化影响的复杂性。传统文化本身就有正和负——积极的、促进社会发展的方面和消极的、有碍社会进步的方面。这两个迥然有别的部分常常混杂在一起，织成了难以拆开的网。真实描绘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自然而然就要被“网”进去。另外，由于

生活经历、文化素养、政治态度的差异，作家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不可能一致的，甚而至于有很大的不同。比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与张道藩、王平陵就有根本上的区别。就是政治态度相近的作家，对待传统文化的认识也不是都相近。自然，文学作品提供给我们的，不会是，也不可能会是简单化的反映。很容易让人识别的，是对某种传统文化的影响并旗帜鲜明地作肯定或否定的描写；让人理解费周折的，是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的表现，以及对应予否定的现象所唱的带着某种难舍情绪的挽歌。

如何“拿来”自然而然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不应该因袭，而应该变革。要变革就要有取舍，要取舍就要有一个衡量事物的标准、取舍传统思想的尺度。时代的要求是取舍的重要标准之一。抗战时代的要求就是要有利于抗日争民主。冯雪峰在《谈士节兼论周作人》一文中谈到了这个标准。他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了先秦以来的士节观，认为伯夷、叔齐、严子陵、陶潜等被“举为烈节或忠节的代表人物也多是失败的英雄”，原因在于他们所持有的“是这么可哀的一种孤立的東西”。这当然不合时代的需要，应该有能满足抗战时代要求的尺度。这就是将士人“这一种独立的精神和节操这种尊贵的德行与历史的伟大的叛逆——革命相结合”，也就是将传统的士节与抗战时代相结合，以是否有利于抗日争民主来进行取舍。还指出，如果不与时代相结合，如果仍坚持脱离社会发展的士节观，那就要走上为节而节之路，结果就会变节，如周作人。郭沫若也谈了这个时代的标准，不同的是更加具体化。他提出了取舍传统文化的四个条件：第一，“合于民族的原则”。具体解释：“必须是抗日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自信心，正确把握住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所谓“民族的实际与特点”是指“一方面要看到我们是具有悠久的历史，辉煌的文化的民族，它的子孙，具有相忍为国的精神，具有刻苦耐劳的美德，具有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胸襟，它是气魄

雄厚的伟大民族”。第二，“合于民主的原则”。具体解释：

“必须是反封建，反专制，主张思想自由，主张民主政治，民主生活，民主作风的文化。”第三，“合于科学的原则”。具体解释：“必须提倡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原因：“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因此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①还有一条标准，这里没有提及。这就是人民。1944年初，毛泽东看了平剧《逼上梁山》后给杨绍萱和齐燕铭写了一封信，以人民为尺度作了很高的估价：“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②历史唯物主义和毛泽东对历史的态度给文艺家们提供了梳理历史的理论依据和具体原则，影响极为深远。在历史剧创作和历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的郭沫若就严格按照以人民为本位这个准则对历史进行评判和取舍。他说，“批评古人”所“依据道理”，“便是以人民为本位的这种思想。合乎这种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他还举例说：“我之所以比较推崇孔子和孟轲，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在各家中是比较富于人民本位的色彩。”^③

三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有三大块：以延安为中心的民主根据地，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以及上海“孤岛”、沦陷区等。

① 郭沫若：《四年来之文化抗战与抗战文化》，曾健戎编《郭沫若在重庆》324、325、326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

② 艾克恩编：《延安文艺运动纪盛》48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③ 《后记——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十批判书》423～424页，科学出版社，1956。

尽管地域不同、政治状况各异，可在向祖先索取上却有着许多相似。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特别是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原因，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对传统文化有了比以前更多的重视。郭沫若创作的《屈原》等六个影响巨大的历史剧就出现在这个时期，现代历史剧创作的黄金时代也出现在这个时期。郭沫若领导下的文工会在发掘和正确估价历史传统方面还做了不少有意义的工作。“孤岛”，特别是沦陷区，抗日文学作品的发表受到限制，甚至不可能；但南望王师的作家们又不愿沉沦，于是就去描绘历史往事，在可比拟而又隐晦的描写中抒写自己的爱国情怀。另外，在一些人心中，发掘传统文化还带有抢救的性质。他们感到我国的传统文化面临着危机。1939年4月杨刚写了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诗开首就说一直过着宁静而祥和、“活了有个四五千岁”的我，“华族五千年的灵魂”，被任意践踏。孔子提出的仁，扩展出来的仁者爱人，“已经给自私，强横，懦弱，虚伪，贪虐，残暴，/用铁链锁上了”，“地球已经遗失了它的仁爱”。诗主要写的是外国侵略者用“铁链”“锁”上了我们的“仁爱”——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其实，我们自己中的一些人对祖先抱的也是轻视态度。这在凤凰从火中更生的“五四”时代就开始了。在一些人心中，外国的东西才有价值，孔家店早就该砸了。尽管历史向他们说的是不，可不良的影响和严重的后果却在不断向人们袭来。由此，“拿来”的紧迫感也就更增强了。

“拿”些什么来？

最重要的，是民族正义。中华民族是十分注重气节的民族。《左传》就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之说。当外族入侵时，这种气节的内涵无形之中就得以扩充，充满了强烈的民族精神。从汉到清，上千年的历史记载了不少这样的典范，没有在史书上留下文字记载的无名英雄那就更多。中华民族的历史因为有了他们而更加辉煌，他们也因此而受到了一代又一代炎

黄子孙的敬重与讴歌。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殊死斗争中，神州大地怒火燃烧的人们自然而然要向坚持民族气节的祖先寻求支持和力量，而对那些历史上浑身充满着民族正气的前人们的重新发掘与认识无疑会促使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烈火烧得更旺。这就是以发扬民族精神为主旋律、以历史题材为内容而形式又多样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现的重要原因。许多文学作品是将这二者结合起来进行描写的。《屈原》、《虎符》、《大明英烈传》、《正气歌》、《秦良玉》等历史剧及其他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就这样产生了。

抗日和争民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的社会是一个政治势力多元化的社会。在新旧军阀统治之下，中国共产党历经磨难，发展并壮大起来，以至于逐渐形成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抗战时期。当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伸向东三省时，中国共产党就呼吁消除前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不懈努力，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主张得到了各政治派别的认同。虽不同政治观点的人都聚在了统一战线旗帜之下，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安无事，事实上也存在着矛盾和斗争，有时还非常尖锐。皖南事变就是有力的证据，而且，这之后，国民党在其统治区还大搞白色恐怖。进步文艺工作者们不屈服高压，也不想马上就唱“杀头好比风吹帽”。既要斗争又要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到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中去寻借鉴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郭沫若在谈到《屈原》的创作时就明确地说过，他把对国民党的不满和愤怒复活在屈原的时代，借屈原的时代来象征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年代，屈原自然也就成了大无畏的正义的化身。剧中的“雷电颂”最具有代表性，它是反抗黑暗的怒吼，刺向专制的利剑。类似的作品不仅有戏剧，还有小说、诗歌、散文。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从历史中去寻求类似，以历史比照现实，将历史现实化，现实历史化。

传统文化远比上述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无论是回溯历史还是审视现实，都能发现，各部分内涵并没那么纯粹，总是

和其他成分融会在一起。要正确地“拿来”，必须对其他文化成分去粗取精。另外，现实是历史的现实，传统文化浸润着生活的每一个细胞。由于时代的发展与科学的进步，对祖先遗留给我们的东西应该而且有必要用“现代”的眼光重新加以审视，以利于历史的未来。比如，隐含等级观念的君臣父子、缺乏原则性的折中与公允、冥冥世界中的神和鬼、轻视妇女的三从四德、被折磨得不知反抗的愚昧与麻木，以及富于人性的惻隐与友爱、还没有受“文明”污染的质朴与纯真……这一切，都不是简单说一个肯定或否定就完事，必须仔细地研究、分析，才能得出合乎科学的结论，也只有这样才能“拿来”。

目 录

第一章 “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

- 一、民族正气贯长虹 (1)
- 二、“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12)

第二章 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

- 一、让大地充满爱的阳光 (24)
- 二、义气、骨气与隐忍 (33)
- 三、胶合着粗野与正义的原始强力 (42)
- 四、传统礼教的两种模式 (54)

第三章 去掉无形锁，清除劣根性

- 一、挡不住的围墙 (74)
- 二、精神还在那里胜利 (89)
- 三、“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 (98)
- 四、麻木、愚昧与奴性 (112)

第四章 殷殷沸腾血，拳拳火热心

一、功炳千秋	(125)
二、《新华日报》与抗战文艺	(140)
三、强烈的民族感，深厚的故乡情	(148)
四、郭沫若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	(162)
五、更上一层楼	(172)
六、罗荪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	(182)
七、“新的时代”的勤耕者	(196)

其 他

一、郭沫若与孔子及其学派	(210)
二、冥冥世界的困惑	(222)
三、谈方敬的散文	(237)
四、老舍的通俗文艺思想	(246)
五、从陈铨的作品看“战国派”的文艺观	(261)
六、“五四”写实思潮	(271)
七、鲁迅小说中的讽刺	(284)
八、试论《为奴隶的母亲》与《生人妻》	(301)
后 记	(311)

第一章

“生当为人杰， 死亦为鬼雄”

一、民族正气贯长虹

数千年的历史表明，中华民族是民族感强烈的民族。历代都有这方面的记载。西汉时的苏武，奉命出使匈奴被扣，威胁利诱不能屈其节、牧羊苦寒不能丧其志、经历了 19 个春秋才见到了故乡明月。宋朝的文天祥更为可歌可泣。他辗转逃亡、九死一生的经历，他那气势磅礴的《正气歌》，以及昂首刑场的高大身影，永远铭刻在世人的心中。明代的戚继光，成功地抗击倭寇从海上入侵，捍卫了民族的尊严，保卫了一方平安。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不断入侵，生灵涂炭，割地赔款，灾难深重。日本侵略者独霸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30 年代更是变本加厉：1931 年侵吞了东北，1937 年又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忍无可忍，燃烧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烈火。如果说史载的民族精神有时还带有某种狭隘性的话，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侵略的风暴无可怀疑地具有大中华的性质。

(一)

我们的祖先，“他们为保卫土地／从不曾屈辱过一次。”（艾青《北方》）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继承祖先“不曾屈辱过”的精神？各种文学作品满怀激情地表现了祖先的这种精神演化出来的强烈的民族意识。“救亡的感情像沸水，／使大家全部变成了疯狂，／这声音，比敌人的炸弹更响，／这声音，像爆裂的火山一样”（臧克家《伟大的交响》）。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人们都在积极参与，时髦的口号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如果嗅到一丁点儿被认为含有“异味”的言论，比如梁实秋的“文学可以与抗战无关”论，就要进行严厉谴责。抗战就是一切，可战局屡传不利。如果做了“遗民”，除了“泪尽”，不可能有更好的选择。

作家们热情歌颂了具有“像沸水”一样“救亡的感情”的民族武装。他们知道，没有这样的武装就没有民族战争的胜利。戚继光正是因为有了他的戚家军才成功地粉碎了倭寇从海上侵犯的阴谋。郑成功能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靠的也是他那不辞劳苦渡海作战的数万民族志士。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是抗战的中坚力量。他们有“沸水”样的民族感情，并且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平型关歼敌精锐板垣师团就是其一。沙汀、周立波、田间、马加、魏巍、邓拓、雷加、鲁藜、周游、西圣等对其做了真实的反映。爱国热情也表现在一些转向的军队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树立起来之前，辛亥革命以来，中华大地没有消失过战争的烽烟。长达一二十年的新旧军阀混战还没有结束，又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对工农红军的“围剿”。日寇疯狂进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变化了的形势面前，阶级矛盾下降、民族矛盾上升了。国内各政治势力几经曲折，在抗日救亡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枪口一致对外，还打了一些硬仗，比如“八一三”上海抗战、台儿庄歼敌。郭沫若、林林、

田汉、宋寒衣、郭我力、辛劳、艾芜、胡怀琛、赵景深等都热情歌颂了他们的民族主义精神。除了正规军之外，还出现了不少群众性的地方抗日武装。他们不愿当亡国奴，将祖先不屈辱的精神化为了自己的实际行动。曹白《访江南义勇军第×路》写了长江南岸与太湖东岸一带民众不屈的民族情感和救亡斗争——民众组建的游击队“非常的多，宛如晴夜的星星”。同以这一地区为背景的是谷斯范的长篇《新水浒》。这部小说以太湖为背景，写那里的民众武装的不屈战斗和由不纯到纯、由游吃队变成真正游击队的故事，为太湖抗日武装唱了一首令人难忘的民族赞歌。从客观上来讲，不拿起武器也没有出路。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田间《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作家们也热情歌颂了普通民众“像爆裂的火山一样”的爱国精神。这种精神促使了民众从军观念的变化。过去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现在是好男要当兵，还要争取当好兵。杜甫《兵车行》神鬼皆悲，抗战“兵车行”振奋人心。“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古今依旧，可“爷娘妻子走相送”时出现的“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的凄惨情景却不见了踪影，而“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后果也不复存在。代之以什么呢？田汉《征夫别》作了回答：

“（男唱）马萧萧，车辚辚，/辞了情人去出征，/（女唱）车辚辚，马萧萧，/送我们的战士去把国家保……（女唱）送情郎，上战场，/抗强敌，/救危亡，/祝凯旋，/还故乡，还故乡！/（男唱）别情人，上战场，/抗强敌，/救危亡，/不凯旋，/不还乡，不还乡！”由悲戚变成了豪壮。还不仅如此，王昌龄《闺怨》写“不知愁”的“闺中少妇”春发感慨：“悔叫夫婿觅封侯。”抗战时的少妇不仅不悔，自己还要去呢！老舍在《兄妹从军》中写道：“王家少妇不知愁，夫婿出征雪国羞。更有银娥奇女子，雄心壮志美名留。”由消极的“悔叫夫